

評 曹 操

历史系学员 童克勤 张德明 罗运环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千余年前，曹操平冀州，征乌丸，驱马扬鞭，统一北部中国的豪迈形象跃然纸上。

然而，曹操这位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历来受到尊儒反法派的攻击和诬蔑，并被儒生们丑化成所谓“不仁不义”的“奸臣”。当代的大儒家林彪，在咒骂秦始皇的同时，也竭力攻击曹操，为他们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制造舆论。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评价曹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对于揭露、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

一

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他出身宦官家庭。早年曾做过洛阳北部尉、顿丘令，议郎和济南相。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封魏王。

曹操生于东汉后期。当时，东汉统治极端腐朽反动，对农民的压迫、剥削，愈来愈重，阶级矛盾急剧上升。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①黄巾大起义用革命的手段扫荡各级封建官僚机构，基本上打垮了东汉王朝的黑暗统治，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黄巾大起义打乱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中断了土地集中的恶性发展，杀死了和驱散了一批豪强地主，在广阔的范围内造成了“土业无主”^②的新局面。

黄巾起义削弱了大豪强军阀的割据势力，扫荡了地方豪强的割据局面，为北方统一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黄巾农民军，在起义中提出了“苍天（东汉）已死，黄天当立”的革命口号，要把地主阶级的“苍天”变为农民的“黄天”。从而猛烈地冲击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思想，在反孔斗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黄巾农民大起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③，这样，黄巾起义终于被地主阶级残酷镇压下去了。

黄巾起义的胜利成果和创造的新条件，为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所利用，成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地主阶级在联合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原来就拥有家兵的豪强武装，各自独霸一方，形成了割据混战的状态，给人民和社会生产带来了莫大的灾难。中原地区到处是一片萧条景象，“或百里无烟，城色空虚，道瑾瑾（饿死的人）相望”^④。曹操在《蒿里行》中也十分感慨地描写这种情沉说：“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在这种残酷的社会事实面前，地主阶级如何继续统治下去，革新派与保守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政治主张，形成了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代表世族豪强地主利益的保守派以孔孟之道作为指导思想，主张恢复东汉王朝的黑暗统治，推行一条儒家分裂割据的反动路线，就是要开历史的倒车。相反，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利益的革新派，则把法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主张重新建立统一的地主阶级政权，推行一条坚持统一集权的法家路线，利用农民起义创造的条件发展封建经济，完成统一。

列宁指出：“阶级斗争，人民中的被剥削部分反对剥削部分的斗争，是政治变革的基础，并且最终决定一切政治变革的命运”^⑤。

在黄巾起义以前，一些革新的人们，如李膺等，曾在东汉王朝黑暗统治之下，大声疾呼，要求革新，但由于没有农民革命的基础，只落得悲惨的结局。

黄巾农民大起义引起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剧烈分化。早在黄巾起义以前，李膺主张革新的年代，革新派的力量是十分薄弱的。黄巾起义基本上打垮了黑暗腐朽的东汉王朝，就使得保守派失去了最顽固的堡垒和后盾，力量大大削弱和分散，为一大批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政治代表解除了世族豪强的压抑，使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革新派形成了一股足以战胜保守派的强大的政治势力。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没有农民的阶级斗争，革新就没有基础，只有农民阶级斗争的伟大力量，才能使地主阶级革新派有成功的可能。

曹操正是利用了黄巾起义所提供的现成条件，并在农民起义所造成的政治舞台上，充分发挥了他个人勤于学习、敢于斗争的长处，以反潮流的姿态，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变革，推行法家路线，终于完成了北中国的统一事业，并为重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奠定了基础。

二

完成北部中国的封建统一，是曹操一生中最主要的功绩。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⑥。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⑦曹操顺应历史的潮流，利用人民的力量，从初平元年（公元一九〇年）参加讨伐董卓的联军开始，到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二〇年）逝世，三十年间，消灭袁绍、张绣、刘表、吕布、马超、韩遂等大大小小数十个军阀豪强集团，平定乌丸，统一了北部中国，重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曹操自己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⑧。这虽夸

大了个人的作用，但曹操为统一所作的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战胜割据军阀，要有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要有足够的军粮，最根本的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曹操执行法家路线，正是他完成封建统一的根本保证。

毛主席指出：“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曹操的法家路线是在同儒家复古倒退势力尖锐斗争中推行的，其主要对立面就是门阀豪强势力的头号政治代表袁绍。

袁绍据冀、青、幽、并四州，拥兵十万，物资丰厚；而曹操仅豫、兖西州之地，兵少粮乏，力量远不如袁绍。但是曹操终于战胜了袁绍，从路线上看，曹操战胜袁绍的斗争，是法家路线战胜儒家路线的斗争。

曹操继承了秦皇汉武的路线，坚持统一，反对分裂；袁绍则站在大地主豪强的立场上，大搞分裂，开历史倒车。这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始终处于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中。

公元一九〇年，曹操初“兴义兵”^⑨，便打出了谋求封建统一，反对分裂倒退的鲜明旗帜。而袁绍等人，则以讨伐董卓为名，行分裂割据之实，“拥兵观望，莫敢先进”。曹操独军西进伐董，败于汴水，还兵酸枣。袁绍等人仍“日置酒高令，不图进取”^⑩，并两次阴谋另立讲究“礼义化民”的幽州牧刘表为帝，搞割据分裂；又私刻金印，在曹操面前炫耀，并派人威胁拉拢曹操说：袁家“受命当王，符瑞炳然。”^⑪。“二子已长，天下群英，孰能踰之”^⑫？对袁绍卑鄙无耻的倒退行径，曹操很愤慨和鄙视，回答说：“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⑬自此，曹操和袁绍，一个举着坚持统一的旗帜，一个举着分裂倒退的旗帜，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革除旧政，谋求统一，一个裂土大分封，让自己的儿子、女婿“各踞一州”^⑭，两家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曹操实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革新措施，都是与袁绍为代表的尊孔派门阀豪强反动势力针锋相对的。

第一，曹操“肇申商之法术”^⑮继承了申不害、商鞅的“法任而国治”的法治思想，以法治为武器，打击豪强地主，以法治政，以法治军，收到了好的效果。

当然，到东汉末年，地主阶级的“法”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防范人民造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革新派要求改革政治，促进统一，势必与那些反对改革，坚持分裂的反动势力相对立，从而使“法治”又具有打击分裂势力的积极的一面。曹操“法治”精神的进步意义正在这里。

曹操的“法治”与儒家的“礼治”是截然对立的。孔丘的“礼治”即“克己复礼”之治，就是要恢复周代那一套“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奴隶制度。孟轲讲“仁政”就是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要求对奴隶主贵族施“仁政”。腐朽的东汉统治集团搞什么“宽政”，放纵豪强地主恣意兼并，致使“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⑯，为封建割据种下了祸根。袁绍为了做皇帝，“高议揖让以收名誉”^⑰，使豪强发展更快，结果皇帝梦也破灭了。曹操反其道而行之，以“法治”为手段，打击豪强，抑制兼并，澄清吏治，造就一支能够战胜割据势力、完成统一的地主革新派武装。执行法治是曹操能够战胜袁绍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法家人物郭嘉对曹操所说“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能摄；公纠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也”^⑱。

曹操法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击和抑制豪强地主。早在曹操初登政治舞台，就对豪强进行了打击。任洛阳北部尉时，“造五色神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①，连灵帝的宠臣蹇硕的叔父因违令夜行，也被干掉了。后任济南相，管辖十余县，对“防附贵戚，赃污狼藉”的县令“奏免其八”^②。公元二〇四年，颁打击豪强的命令——“重豪强兼并之法”。令中揭露了袁绍“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的罪行，将原来的苛捐杂税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削减，为了防止豪强转嫁田赋负担，特别强调指出：除规定租税外，“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③。

在统一战争过程中，曹操对自己手下的豪强也给予了一定的抑制。如任峻、李典、许褚等豪强地主带领党羽投奔曹操后，曹操采取各种方法取消了他们的豪兵部曲，削弱了他们的权力。为了防止豪强地主势力膨胀，曹操改革了汉代的爵位制度，对王族子弟执行皆不食租的“虚封”，规定宦官任职不得超过诸署令，外戚不得辅政。他还反对“州郡领兵”，公开宣布自己决不“慕虚名而处实祸”^④。曹操重视主持刑法工作的人选，清除了一些不够条件的人，提拔了一批“清识平当”^⑤、“明达法理”^⑥的人。在曹操的提倡和支持下，许多官吏也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打击豪强，限制兼并的法治精神。

豪强地主是分裂割据的社会基础，是使东汉王朝由统一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曹操对豪强地主实行打击和抑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割据的社会基础，克服了统一北方的障碍，为重建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创造了条件。

曹操法治的另一个内容就是严格赏罚制度。曹操效法先秦法家“刑罚不避大臣，赏赐不遗匹夫”的思想，提出了“不官无功之臣，不赏无战之士”^⑦和“赏罚孰明”^⑧的法治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做到“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⑨。对违令犯法者，坚持“设而不犯，犯而必诛”^⑩的原则。曹操的堂弟曹洪的宾客，恃势犯法，许令满宠以法治之，曹洪想通过曹操为其宾客说情，满宠先杀了宾客。曹操称赞满宠说：“做官办事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曹操法治的第三个方面是“以法治军”。曹操认为“礼不可以治军”，“我在军中执法是也”^⑪，曹军军纪严明，勇猛善战，与“以法治军”有密切关系。曹操制定了许多军令、命令，严格规定了行军作战的纪律。如，“军行，不得斫伐田中五果桑柘棘枣”^⑫，“兵进，退入阵间者斩”^⑬，“士将战，皆不得取牛马衣物，犯令者斩”^⑭等等。曹操不仅制定了法令，而且还能带头执行。他的儿子曹彰带兵北伐乌丸，临出发时，曹操对他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⑮。还有一次，在麦田间行军，曹操命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兵都下马扶麦而行，可是他的马却跃入麦中，于是要求主簿给定罪，主簿以《春秋》经上的“罚不加尊”对答，曹操说：“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⑯，立即拔剑割发掷之于地（古代割发是一种刑罚）。由于治军严谨，所以军队听从指挥，服从命令，“虽使众人，如使一人”^⑰，官兵“殊死战”^⑱。

第二，曹操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法家的“耕战”政策，推行屯田制度。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曹操下令兴屯田制。

曹操要实现统一，首先遇到的是军粮问题。由于分裂割据，军阀混战，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摧残，造成“民人相食，州里萧条”^⑲的惨景。袁绍袁术的军队只得吃桑树籽和蚌螺肉，其他军阀因无粮食吃，“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⑳。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为了解决军粮，保证统一战争的进行，效法秦皇“以农兼天下”、汉武“以屯田定西域”的“良式”，制定了

一条“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的方针，推行屯田制。

屯田分兵屯与民屯两种，兵屯即组织士兵进行农垦，“战不废耕，耕不废战”，所获全部归官。民屯是招募“流民”充当屯田客。有牛者所获官私各半，无牛者国家借牛，所获官六私四。

当然，曹操用于许下屯田的大量生产资料都是从黄巾军手里夺过来的（“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④），并且对屯田人民的剥削很重，但是，与“饥则寇略，饱则弃余”^⑤，“纵兵抄掠”^⑥的其他军阀相比，曹操能用屯田的方式组织“流民”和士兵一起耕种荒芜的土地，确是高明得多，积极得多。

屯田制促进了北方的生产恢复和发展，单位面积产量有所增加，“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⑦，从而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物质基础。当年，“得谷百万斛”^⑧，“数年中，所在积聚，仓廩皆满”^⑨，使曹军“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⑩。

屯田制不仅是解决粮饷，恢复生产的一项经济措施，而且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封建国家直接掌握了部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并把二者结合起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兼并，削弱了封建割据的经济基础。

第三，曹操继承先秦法家“任人唯贤”的路线，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

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还必须有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以选择人材，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曹操从建安八年到建安二十三年（公元二〇三——二一七年）的十四年间，接连下三次求贤令，其基本内容是：凡是“果勇不顾，临敌力战”、“有治国用兵之术”、“堪为将守”、“能成就大业”的人，不管是“放在民间”，还是“出于贱人”，也不管是“不仁不孝”，还是“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⑪的，一律采用。

曹操的“唯才是举”，是对门阀世族世袭官僚制的沉重打击，是对儒家道德标准的公开挑战。东汉时期的用人标准首先是讲究世资门第，豪强地主可以世代为官。当时推行的所谓“察举”、“征辟”制度，所举所征的多是豪强地主子弟及其亲戚。当时人就指出这种用人制度是“以钱为贤，以刚为上”^⑫。其次是以儒家虚伪的品行为准绳，选录的都是些“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⑬。既不会治国，又不会打仗，只会摇唇鼓舌，招摇撞骗似孔子的政治骗子。曹操对儒家的这套取士标准十分怀疑：“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⑭。他以用人不计门第，不论“品行”的“唯才是举”的原则，冲破了儒家的取士制度。

曹操“唯才是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念旧恶”^⑮。杰出的封建政治家曹操胸怀比较宽广，对那些反对过自己，但愿意悔过的人，仍量才录用，其中最典型的是陈琳。陈琳咒骂曹操，骂得很厉害，他在为袁绍代写的一篇“声讨”曹操的檄文里说“操赘阉遗丑”^⑯，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后来袁绍失败，陈琳被俘，曹操见他承认错误，愿意悔过，不但不杀，反而重用了他。还有张绣、刘雄等，几次降而复反，最后，曹操还是恢复其官职。这与反对过自己的人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孔孟之徒形成鲜明对照。曹操之所以能这样做，是从能否完成封建统一这个地主阶级的大局出发的，是孔孟之徒的见解所不可比拟的。

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组织路线。曹操维护统一，要求革新，就要“唯才是举”、任人唯贤，所以录用了许多有法家思想有真才实学，又忠诚于封建统一事业的人材。他重用郭嘉、满宠、刘放、孙资，“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立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⑰。以从有实践经验的士

卒中选拔文臣武将的实际行动，批判了任人唯亲的反动路线。而袁绍搞分裂割据、复古倒退，也就一定要任人唯亲，结党营私，任用于嬖袁尚兄弟和高干为四州刺史，以豪强“名士”审配、逢纪为谋士。一些有本事才能的人如沮授、田丰、许攸、张郃等不但不被重用，有的反为所害。执行什么样的组织路线也是曹胜袁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曹操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法家“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曹操反对天命，不信迷信，自称“性不信天命之事”^⑤。任济南相时，就打毁祠堂六百余座，禁止官民祠祀，“除奸邪鬼神之事”^⑥。在《步出夏门行》一文里，他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⑦，认为生命的长短不完全决定于天，自己善于保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曹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集中表现在《孙子注》一书里，他认为天并非是什么有意志的上帝，“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主张作战要“因阴阳四时之制”^⑧，明确提出：“禁妖禅之言，去疑惑之计”^⑨。他还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他说“无穷如天地”，“势盛必衰”。“兵无常势”如“水无常形”，应该“因敌变化，取胜若神”^⑩。曹操崇拜先秦著名的无神论者西门豹，在《遗令》中他要求死后“葬于鄴之西岗，与西门豹祠相近”^⑪。

曹操不信天命，自然也就强调人的因素。他认为“天地间，人为贵”^⑫。在一次与袁绍的对答中，他讲，“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⑬，意思是说，我凭借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以正确的路线为指导，没有什么办不到的。曹操有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军事思想，他说：“战在我，非在贼也”^⑭，认为在战争中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战胜敌人。

信不信天命，不只是个思想认识问题，它是与政治斗争紧密相联并为其服务的。孔丘用“天命观”反对社会变革，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为了防止农民造反，反对革新，反对进步。袁绍袁术想做皇帝也制造“黄应代赤”、“宜顺天意”^⑮的反动舆论。曹操要改革政治，就必然背离孔孟之徒宣传社会停滞的谬论，以朴素的唯物观点和辩证观点来反对“天命”，反对“不变”，以先秦法家“制天命而用之”等进步理论作为改革的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曹操推行一条法家路线，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领域里进行了一些较大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儒家反动的意识形态，改革了东汉末年的弊政，这对于封建的统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东汉末年，曹操不愧为一个英雄。

三

曹操营垒内部，儒法两家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得十分尖锐。与外部的斗争相呼应，时起时伏，从没间断。尊孔派交替使用武装的与“和平”的两手，向曹操进攻。一方面，他们以武装政变的方式同曹操较量，想直接搞掉曹操的政权，取而代之；另一方面，便是千方百计地用儒家复古倒退的政治纲领来影响以至改变曹操坚持前进、大胆革新的法家政治路线。

尊孔派旨在推翻曹操政权的武装政变，先后由车骑将军董承、献帝伏皇后、太臣令吉

本、魏国西曹掾魏讽发动了四次，其中以董承于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前搞的阴谋政变为最典型。董承原是董卓部下的一个军官，本人是献帝的宗族亲戚（表叔），女儿又是献帝的“贵人”（位次皇后）。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到许昌，董承与献帝同往，自以为护驾功高，想走东汉后期外戚专权的老路，对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推行法家政治路线，极为仇视。乘袁绍十万大军压境的时机，企图从背后插一刀。他利用献帝对曹操的不满，密传书信，暗中串联了长水校尉王服，议郎吴硕等人，谋“诛曹公”。董承仿效吕不韦的阴谋手段，对王服说：“昔吕不韦之门湏子楚而后高，今吾与子由是也。”梦想象当年吕不韦通过搞阴谋，使子楚当秦王，从而充任宰相控制朝政那样，搞掉曹操，独揽大权，改变法家政治路线，搞倒退，搞分裂。

董承在搞阴谋这一点上，和吕不韦是相似的，不同的是，他不是把人当“奇货”，而是直接动刀枪。他操纵了几个跟他一起搞倒退的人，以为一举便可“得曹公成兵”^④，控制军政大权。然而，他只看到了吕不韦的暂时得势，而没有想、也不敢去想秦始皇粉碎吕、嫪政变之后，吕不韦的可耻下场。搞阴谋总会露出马脚，当董承迷梦正酣，曹操发现了他们的阴谋行径，立即坚决镇压，这伙复辟狂，还没来得及动手，便成了刀下鬼。曹操粉碎了董承的阴谋政变，为官渡之战的顺利进行，排除了内患。

尊孔派发动的四次武装政变，一次都没有成功，原因只有一条：在前进与倒退、统一与分裂这两条路线中间，他们是“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

武装对抗之外，曹操同内部尊儒派的斗争，更大量的是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进行的。

自东汉后期以来，世族地主政治集团，为垄断政权，专以世资门第和孔孟“名教”作为品定人才的标准，一批祖传儒术，浮华无能，专靠油咀滑舌欺世惑众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麀集一起，形成一股最腐朽反动的政治势力，即所谓“名士清议”派。在军阀混战中，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先是边让，后是吉本、魏讽钻进曹操政权内部，时刻企图改变曹操的政治路线，造成曹操“外对敌国，内有奸谋不测之变”^⑤的复杂局面。

主张倒退分裂，反对统一、革新，是尊儒反法派的共同特点，曹操同“名士清议”派的斗争，也首先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公元197年，曹操杀了恶毒攻击统一战争的“名士”边让，揭开了同“名士清议”派公开斗争的战幕，接着，斗争矛头便集中在孔融身上。

孔融，是孔老二的第二十世孙，是世袭的豪强地主，他全盘继承了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标榜“德治”，空谈“圣教”，这个家伙和他所纠集的一帮子儒生，都是些不懂生产、不懂行政、不懂打仗的政治骗子。孔融本人，在任北海相时，鼓吹礼治，“表显儒术”，结果“连年倾复，事无相济”，后来袁谭（袁绍长子）攻城略地，城内“流矢如雨”，这个反动腐儒不顾百姓死活，还“凭几安坐”，而“城坏众亡”^⑥连老婆孩子都被掳去。就是这么个亡国失政之徒，搞复古倒退，耍阴谋诡计却颇有一套。

在曹操迎汉献帝建都许昌后，他凭着伪善的两面派手法，削尖了脑袋，混到曹操身边，当上了大中大夫。他认为曹操行法弃礼，搞乱了套，上台不久，便抛出一个反动政治纲领，主张“不苟革其政”^⑦，要曹操“依旧制，定王畿”^⑧，搞千里割地大分封，这个“不识时务”的复古倒退主张，集中反映了世族豪强各霸一方的要求，正与曹操的路线背道而驰。曹操坚定不移，挥师征战，坚持革新，以最后统一北方的胜利，来回击了这个孔老二的孝子贤孙。

对曹操为实现封建统一而采取的一系列革新措施，孔融“发辞偏宕，多致乖忤”，无不尽攻击污蔑之能事。当时连年用兵，生产发展缓慢，曹操为节约粮食下令禁酒，孔融极力反对，以为“酒之为德久矣”，“天垂酒星之欲，地列九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纵酒奢侈，是古今天意，并嘲骂说：“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⑨曹操北征乌丸，他说是“萧条海外”的不义之举。在用人上，孔融极力推崇名门儒士，与屁儒祢衡相互吹捧，祢衡说他是“仲尼不死”，他说祢衡是“颜回复生”。他反对曹操打击豪强的政策，197年，曹操逮捕了同袁术有勾结的大豪强杨彪，孔融破门而出，披着衣服跑到曹操面前，横加指责威胁，扬言如果杀杨彪，孔融“鲁国男子，明日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⑩。在审讯杨彪时，斗争更为激烈，孔融暗中要求主持审讯的满宠，“但当受辞，勿加考讯”。但忠于曹操法家的满宠，不听那一套，“一无所报，考讯如法”^⑪。结果，还是罢了杨彪的官，打击了孔融的帮凶。孔融对他同党如此包庇，而对曹操坚持从下层军吏中举用人材的“唯才是举”的路线，极力攻击，说非名儒高士，德行不足，资历浅薄，只“可与适道，未可与权”^⑫，不能参予军机大事。曹操义正辞严地驳斥孔融这种谬论说：你认为下层军吏虽有功能，而“德行不足堪住郡国之选”，只不过是一根竹管里看老虎，是一孔之见！并列举齐桓用管仲而成霸业等事实，阐明“唯才是举”的任人路线的正确性。

孔融抛出的复古主义纲领和对曹操革新措施的恶毒攻击，影响十分恶劣，当时就有人提出罢掉孔融，曹操为当时条件所限，为顾全大局，虽深恶痛绝，但还是“外相容忍”，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宽宏，没有杀他。

历来尊儒派的头子，都以搞阴谋诡计著称，并且都是死不悔改的。孔融并没有因为曹操的批判和宽容而改邪归正，相反，更变本加利采取阴谋手段向曹操进攻。他利用窃取的地位，拼命发展个人势力，“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⑬，煽动群儒，干涉朝政，搞的“诸卿大夫隶名而已。”^⑭孔融一伙的复辟倒退活动达到了疯狂的顶点，曹操再也不能容忍了。205年，曹操基本消灭了袁绍割据势力，北方统一局面趋于稳定，便向冀州地区的“名士清议”势力进攻，发出《整齐风俗令》，旨在揭露孔融一伙结党营私，造谣生事，排斥贤良的阴谋行径。令文中说，“阿党比周，先圣之所疾也，……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谓之申伯，王商忠义，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⑮这里第一句话就指出：结朋联党，为所欲为，是从来为人所痛恶的！直接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孔融一伙。并揭露“无兄”谓之“盗嫂”，是无中生有的造谣，“娶孤女”而“谓之挝妇翁”是歪曲事实的诬蔑，奸诈说成公正而忠义说成“左道”，是“以白为黑，欺天罔君”，凡此种种，都是儒门名士为排斥下层人物制造的谬论。这道命令，实际上是对孔融一伙的最后警告。然而，孔融自以为才高德重，丝毫不放在眼里。公元208年，曹操北征乌丸回来，为加强中央集权，自任丞相。孔融对此更是咬牙切齿，活动更为猖狂，“坐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纠集儒士，“招合徒众，欲规不轨”，肆无忌惮地“谤讪朝廷”。曹操深知若再留下这个屁儒，势必使统一事业遭到损害，便下决心把他宰掉，摧毁清议名士派的顽固堡垒。曹操满怀怒气，“中夜日起”，挥笔疾书与孔融：“……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明明白白地告诉孔融：我虽然不能以儒家那套主张来治理天下，也不会以孔孟之德来迎合“名士”巨儒，然而，要清除你们这帮欺世盗名的政治骗子，还是不在话下的！随即将孔融“下狱弃市”^⑯，又宣示其罪状，说明孔融不仅

该杀，而且“犹恨其晚”！

诛边让，杀孔融，是儒法斗争的必然结果，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的继续，是曹操法家路线的胜利。这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表明，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礼治”与“法治”是不可调和的。要推行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对反动腐朽的政治势力，表示任何心善手软，都是不能成功的。

在三十年的斗争中，曹操表现了杰出的法家政治家机智果敢，敢做敢为的精神。越到晚年，斗志越加旺盛，坚持统一的态度越加坚决。他晚年著名的诗作《碣石篇》中写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叙情豪迈，“歌以咏志”^①的诗句，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他晚年斗志不衰的进取精神。在他临终的时候，仍然不忘反对倒退，坚持统一的大业，他的《遗令》中，首先申述一生中执行法家政治路线的斗争实践，又谆囑部下，“天下尚未安定，未得尊古也”^②，表达了他坚持前进，实现统一的政治抱负。

四

曹操死后，这个三国时期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一直遭到孔孟之徒的歪曲、污蔑和攻击，他们的种种造谣中伤，尽管形式不同，调子有高低，内容却基本一致。首先集中表现在一个“奸”字上，他们一面骂曹操搞了改革，是个“奸臣”，一面宣扬反动的“忠君”思想，主张保守、倒退，其实质，就是要攻击曹操所实行的那条法家路线。他们攻击曹操的另一个“罪名”是“不仁不义”。其实，敢于冲破儒家“仁义道德”的束缚，这正是曹操的优点。曹操对反动的儒生，从来就不讲“仁义”，实行坚决镇压。骂曹操“不仁不义”，就是为被曹操镇压了的反动儒生鸣冤叫屈，攻击曹操实行了严厉的法治。至于曹操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的一面，他们从来也没有骂过。十分明显，他们骂曹操的实质，正是为了把孔老二陈旧的“正名”说教搬来，用以维持那套“君君、臣臣”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秩序。

历史斗争是现实斗争的一面镜子。叛徒、卖国贼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恶毒咒骂法家是“罚家”，把《三国演义》中攻击曹操的诗抄成条幅挂在卧室：“勉从虎穴暂栖（趋）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在这里，林彪借古喻今，咒骂“以法治军”“军声严整”的曹营为“虎穴”，实际上是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但为了达到篡权复辟的目的，不得不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暂时“栖身”，把自己隐藏起来。这就完全暴露了他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

历史上孔孟之徒骂曹操“不仁不义”，林彪就鼓吹“德”、“仁义”、“忠恕”，借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企图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以便组织他们反革命的“基本队伍”，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

历史上孔孟之徒骂曹操是“奸臣”，林彪就提倡“忠君”思想，要他的小撮死党，“永远忠于”林彪一家，达到他建立林家法西斯世袭王朝的罪恶目的。由此可见，基于反动的政治需要咒骂曹操，林彪和历史上的孔孟之徒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林彪就是当代的大儒家。

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规律告诉我们，无论是尊颂儒家，还是反对法家，手段不同，目的一样，就是要反对革命，反对社会前进；主张复辟，开历史的倒车。

鲁迅先生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有力地回击了儒家对曹操的攻击和丑化，他尖锐地指出：“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并针锋相对地评价：“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曹操是杰出的封建政治家，也是军事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在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创造了充分条件的政治舞台上，作为法家的曹操，沿着前进的路，为地主阶级的封建统一事业奋斗了一生。尽管由于阶级的局限，他的革新措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甚至早年亲手镇压过农民起义；由于客观条件不成熟，他没有，也不可能在当时统一全中国。但是，他的革新措施在当时对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他统一北方，进而为全中国封建统一铺平了道路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对他的主流给予历史的肯定，这正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①⑨}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今天，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曹操这位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重新评价，就是要进一步揭示儒法斗争的实质，从中吸取有益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

注：

- ①③ 《毛泽东选集》第588页
- ②④① 《三国志·司马朗传》
- ④ 《三国志·朱治传》注引《江表传》
- ⑤ 《列宁全集》第8卷第176页
- ⑥ 《三国志·王粲传》
-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35页
- ⑧②③③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
- 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三国志·武帝纪》
- ⑭⑮⑯ 《三国志·袁绍传》
- ⑰ 《昌言·理乱篇》
- ⑱⑲ 《三国志·郭嘉传》注引《傅子》
- ⑲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唐顺传》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 ㉛ 《三国志·高柔传》
- ㉞㉟㊱ 曹操《孙子注·计篇》
- ㊱㊲ 《曹操集·遗令》
- ㊳ 《曹操集·军令》

- ㊳㊴ 《曹操集·步战令》
- ㊴ 《三国志·任城王彰传》
- ㊴㊵㊶ 《孙子注·九地篇》
- ㊶ 《三国志·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
- ㊶ 《晋书·付玄传》
- ㊶ 《晋书·食货志》
- ㊶㊷ 《潜夫论·考绩篇》
- ㊷㊸ 《后汉书·袁绍传》
- ㊸ 《曹操集·步出夏门行》
- ㊸ 《孙子注·势篇》、《孙子注·虚实篇》
- ㊸ 《曹操集·度关山》
- ㊸ 《三国志·先主传》
- ㊸ 《三国志·徐晃传》注引《魏书》
- ㊸㊹ 《三国志·崔琰传》
- ㊹ 《三国志·杨彪传》
- ㊹㊺㊻㊼ 《后汉书·孔融传》
- ㊼ 《三国志·满宠传》
- ㊼ 《韩非子·孤愤》
- ㊼ 《乐府诗集》卷37
- ㊼ 《毛泽东选集》第668页